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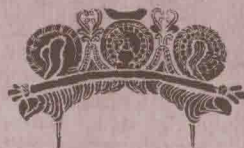


兰州大学 文库

A LIBRA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

赵梅春 屈直敏 主编



中国史学史研究丛书

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

朱慈恩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二十世纪通俗史学研究”
(编号10YJC770127)研究成果



兰州大学 文库

A LIBRA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

赵梅春 屈直敏 主编



中国史学史研究丛书

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

朱慈恩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 / 朱慈恩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5. 1

(中国史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11-04390-2

I. ①2… II. ①朱…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
20世纪 IV. ①K09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1000号

策划编辑 王永强
责任编辑 马继萌
封面设计 郇海

书 名	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
作 者	朱慈恩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390-2
定 价	46.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前言

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资格。”“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并就如何研究与撰写中国史学史提出了具体的、系统的意见，指出史官、史家、史学之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是中国史学史应特别注意的内容。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关注，姚名达、何炳松、周谷城、蒙文通、姚从吾、卫聚贤、郑鹤声、陆懋德、傅振伦、魏应麒、王玉璋、朱谦之、金毓黻、白寿彝等学者都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与教学，从而使中国史学史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专史。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了魏应麒《中国史学史》、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等著作。其中，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被学者誉为中国史学史学科草创时期的代表著作。对此书，白寿彝曾评价道：“金毓黻的书，是在梁启超设计的蓝图上写出来的……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66 页）这一评价也反映了草创期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述的特点。

20 世纪 60 年代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将史学史列入文科教材之一。配合教材的编写，史学界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学科建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探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目的、分期，以及中国史学史教材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方面。经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开始脱离梁启超设计的蓝图，关注历史理论、史学思想、史学发展规律、史学与时代等问题。这一研究风格的变化对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 世纪 60 年代有不少高校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张孟伦先生也在兰州

大学历史系开设此课,并从事相关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1978年一些高校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张孟伦先生被批准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年逾古稀的张先生再次焕发出学术青春,出版了《中国史学史论丛》(兰州大学历史系印行)、《中国史学史》(上下册)等著作,发表了多篇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论文,培养了10余名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首届全国史学史座谈会,旨在交流学术,切磋问题,促进史学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此时张先生已年届八旬,应邀赴京,与白寿彝、陈千钧、张芝联、郭圣铭、高国抗等著名学者共同商讨史学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张先生提出的研究生要读经书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共鸣。张孟伦先生去世之后,由汪受宽先生继续主持硕士点的工作。经过张孟伦先生、汪受宽先生两代学者的努力,兰州大学的史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现有从事史学史研究的教师多人,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四库学,以及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

本丛书收录了张孟伦《中国史学史论丛》、汪受宽《史学史论文自选集》和《历史学基础》,以及朱慈恩《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四部著作,是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点三代学人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重要成果的一次阶段性汇集。《中国史学史论丛》在20世纪80年代兰州大学历史系印行的《中国史学史论丛》的基础上,增加了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若干篇论文,为张孟伦先生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的结集,反映了其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中的创建与成就。张先生治学贵自得之学,独到之见,这部论文集体现了这一治学特点,其中关于孔子史学、《左传》、《汉书》、《三国志》裴注、隋代史学、唐代史学、《史通》、宋代国史撰述、《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日知录》、王夫之史论、《廿二史札记》、章学诚史学等诸多论说,资料丰富,观点独特。汪受宽先生从事史学研究30余年,在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西北地方史等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史学史论文自选集》是其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之荟萃。汪受宽先生在从事史学研究的同时,还关注史学人才的培养。其在总结自己治史经验并吸收学界有关成果基础上所撰写的《历史学基础》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史学研究与论文撰写的规律、技巧与方法,为史学新人进入史学殿堂之指南、门径。求真 是史学的学术品格,致用则是史学的社会要求,历史知识的普及是史学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途径。朱慈恩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对20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并对其基本特征、主要功能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还选择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进行个案研究,全面分

析其编撰特征、流通传播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反映了中国史学史在脱离史部目录解题后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对当前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有着诸多的借鉴和启示。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促进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点史学史研究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赵梅春

2015年1月4日于兰州大学一分部陋室

目 录

第一章 通俗史学概论	1
第一节 南唐通俗史学	1
第二节 中国古代通俗史学的发展历程	19
第三节 研究通俗史学的意义与意义	22
第四节 通俗史学研究的学术史问题	29
第二章 20世纪上半期的通俗史学	33
第一节 20世纪上半期新疆通俗史学产生的条件	33
第二节 20世纪上半期历史通俗读物的主要类型	52
第三节 20世纪上半期历史通俗读物的编撰特征	63
第四节 20世纪上半期历史通俗读物编撰的主要风格	71
第五节 爱国主义思潮与20世纪上半期的通俗史学	75
第三章 历史学家与通俗史学创作	83
第一节 梁启超历史知识大众化的思想与实践	83
第二节 吕思勉通俗史学略论	94
第三节 顾颉刚的通俗读物出版活动	103
第四节 黎东方“解说体”历史通俗读物	117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通俗史学	132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	132
第二节 范文澜与董伯璠的通俗史学成就	141
第三节 许立群《中国史话》与赵毅的《二千年间》	146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通俗史学	155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	155

引言

本书以“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为题。“通俗史学”一词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已经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和采用,但需对通俗史学的内涵进行严格的界定。通俗史学,就是为了适应历史知识传播的需要,采用各种浅显易懂、容易理解的方式来叙述历史或是对历史知识进行加工改造,以达到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史学是其本质特征,通俗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

历史教育与历史知识普及有区别,但本书不做严格区分。历史教育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历史教育系专指课堂中的历史教学活动,而广义的历史教育则是指包括了课堂教学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知识普及,正如白寿彝所说:“历史教育和历史教学,这两个名词的含义不完全一样。历史教学,可以说,只是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历史教育,在历史教学以外,还可以有各种方式。”^①当然,历史教育和历史知识普及之间区别只是理论上的,而且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太明显,同多过异。根据乔治忠所定的标准,历史书籍如果具有了能满足社会各阶层了解、学习历史知识的功能,且具备了相当的流布程度,即可称之为“普及性史书”。“普及性史书”有两个关键性的表征:社会动机和社会效果。^②若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历史教科书,至少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都符合上述表征。而在实践中,历史教材有时也可以当作历史通俗读物来使用。本书以通俗史学为重点,对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则稍有所涉及。

在历史通俗读物编撰过程中,究竟如何写作表达才算作是“通俗”,尚无统一规定之标准,故此本书多引通俗读物之版权页以及广告等,以资说明,唯版权

^①白寿彝:《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见《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9页。

^②乔治忠:《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见《文明演进源流的思考: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瞿林东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1页。

兰州大学
文库

页以及各种书目广告、提要广告等大多在书籍或期刊的封二、封底以及前后衬页中;无法确切标注,所以书中相关引文无标注者基本上都是引自图书广告。

注释和参考文献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本书采页下脚注的形式,大多为标注出处,著作以作者、书名、版本、页码为序。文中所引用的期刊文章,很多又被收入各种论文集中,引用被收入论文集的期刊论文时,在必要时标注最初发表的年代。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期刊大多以卷、期为序,本书征引时,亦注其出版年、月。注释中有极少部分属补充说明、引申发挥的内容,于正文主旨关系不大,故放入注释之中。大段的引文于正文缩进两格,并使用楷体字以示区别。书末附主要参考文献。

本书以 20 世纪通俗史学为研究论域,这一时期的历史通俗读物有很多现在都已有重版,有的还多次再版,本书多使用重版中质量较高、较为常见的版本或是使用全集本,未有重版则使用初版本,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其他研究者可循此线索查询核实,使用重版以便于核对资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的著作重版时也曾经过修订或删改,和初版本略有出入。具体则需将各版本一一对照,但本书主要从历史知识普及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历史通俗读物版本的变化与主旨关涉不大,故此多使用重版。个别著作版本的使用在书中有具体说明。部分外国的人名、书名之翻译,与今译有所区别,在文中仍沿用旧译名,与今译差别过大则加以标注说明。

为学如积薪,本书大量参考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但以行文简洁故,仿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例,文中所提及的诸位前辈学者和当代史家,均直称其名,不加“教授”“先生”等称呼。

目 录

第一章 通俗史学概论	1
第一节 何谓通俗史学	1
第二节 中国古代通俗史学的发展历程	19
第三节 研究通俗史学的意义与路径	22
第四节 通俗史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29
第二章 20 世纪上半期的通俗史学	33
第一节 20 世纪上半期新型通俗史学产生的条件	33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历史通俗读物的主要类别	52
第三节 20 世纪上半期历史通俗读物的编撰特征	63
第四节 20 世纪上半期历史通俗读物编撰的主要缺陷	71
第五节 爱国主义思潮与 20 世纪上半期的通俗史学	75
第三章 历史学家与通俗史学创作	83
第一节 梁启超历史知识大众化的思想与实践	83
第二节 吕思勉通俗史学略论	94
第三节 顾颉刚的通俗读物出版活动	103
第四节 黎东方的“细说体”历史通俗读物	117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通俗史学	132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 历史知识普及工作	132
第二节 范文澜与翦伯赞的通俗史学成就	141
第三节 许立群的《中国史话》与胡绳的《二千年间》	146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通俗史学	155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	155

第二节	唯物史观与十七年间的通俗史学	164
第三节	吴晗与新中国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	178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通俗史学	193
第一节	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通俗史学	193
第二节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通俗史学	198
第七章	当代通俗史学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206
第一节	80年代拨乱反正后的通俗史学	206
第二节	通俗史学与大众传媒	212
第三节	当代通俗史学的发展趋势	217
参考文献		225
后记		234
1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1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01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02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03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04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05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06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07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08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09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10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11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12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13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14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15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16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17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18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19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20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21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22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23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24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25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26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27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28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29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30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31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32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33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34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35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36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37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38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39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40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41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42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43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44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45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46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47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48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49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50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51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52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53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54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55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56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57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58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59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60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61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62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63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64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65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66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67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68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69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70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71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72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73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74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75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76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77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78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79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80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81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82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83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84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85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86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87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88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89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90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91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92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93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94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95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96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97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98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99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100	中国通史简编 章开沅	

第一章 通俗史学概论

通俗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通俗史学进行学理上的全面探讨和学术史上的细致梳理是研究通俗史学的基础工作,进而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史学。本章主要讨论通俗史学的内涵及其主要特征,中国古代通俗史学的发展概况以及研究通俗史学的意义与价值。

第一节 何谓通俗史学

(一)从通俗历史演义、通俗历史小说到通俗史学

“通”“俗”二字出现甚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均已出现,在先秦典籍中已经大量使用。通为通晓,俗指世俗,“通俗”二字连称意谓“通晓世俗”,是指适合广大民众的水平和需要,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含义。

在中国历代典籍文献中无“通俗史学”之名,而只有“通俗演义”之称。“通俗演义”之名源于明代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袁宏道侧重于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解释“通俗”。^①通俗演义属通俗文学的范畴。通俗文学中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即可称通俗历史演义、通俗历史小说,简称历史演义、历史小说,上举袁宏道的《东西汉通俗演义》便是通俗历史演义。清末吴趼人在《历史小说·序》中,提出了“历史小说”的概念:“编撰历史小说,使今人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②历史小说之名虽然在清末方才出现,但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小说却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三国演义》便是中国最为

^①陈大康:《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②吴趼人:《历史小说·序》,载《月月小说》第1号,1906年11月。

兰州大学文库

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中的时代背景、人物环境等要素和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以时代背景、人物环境为框架,再进行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情节的虚构等种种艺术加工,从根本上来说,是文学而非历史,属于通俗文学的研究范畴。

鸦片战争后晚清曾出现了小说演义救国的热潮,有部分借助于历史演义、历史小说的创作,隐喻时事,教育民众。而在有些题名为“历史演义”“历史小说”的著作中,却有部分是严格以史实为依据而进行创作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刊的《演义白话报》曾刊载一部《通商原委演义》,后发行单行本时改称《罂粟花》。此书专记鸦片战争史事,反映了作者强烈的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其书史料有据,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艺术加工,并不超越史料的范围,这是值得重视的”。^①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916—1926),从秦始皇开始写起,包括前汉、后汉、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写了2166年的历史,又名《历朝通俗演义》。全书1040回,共600万言。蔡东藩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全书中体现最强烈的是忠实于史料”,演义的写作遵循了“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例如《元史通俗演义》博采中西史乘,相互对堪,择要汇叙。^② 上述著作是建立在忠实于史料的基础上,撰述不超越史料的范围,是历史而非文学。将其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于是便有了通俗史学的研究。通俗史学中的“通俗”,即取自通俗演义中之“通俗”。

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重版蔡东藩《前汉演义》时,柴德赓撰写了《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一文作为重版前言,对其人其书进行介绍。而将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纳入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则始于吴泽。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版蔡东藩著作时,吴泽作《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为序言,首先刊于《文汇报》上。而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学术界正式使用“通俗史学”这一概念,应该是起自舒焚的《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1987)一文。舒焚在文中认为:“就像俗文学、通俗文艺是各个时期民间的或人民群众的文学、文艺那样,俗史学或通俗史学是各个时期民间的或人民群众的史学。”^③而后,在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1989)中专门设有《通俗史学的发展与蔡

^①张承宗:《鸦片战争史的通俗演义——〈罂粟花〉》,见《江南文化与经济生活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88页。

^②蔡福源:《历朝通俗演义作者蔡东藩》,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5—26页。

^③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钱茂伟:《论史学的普及化与娱乐化》(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合卷)对“通俗史学”这一概念的使用情况有着细致的分析,本书对“通俗史学”这一概念的梳理,有部分内容即参考了钱茂伟的研究。

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编纂》一节,认为通俗史学是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浅显易懂、生动活泼、容易接受的大众化的史学。^①其中部分内容又以《中国近代通俗史学论》(1990)为名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上。彭卫的《中国古代通俗史学初探》(1991)又对舒焚的观点进行系统化的论述和发挥。黄留珠的《时代呼唤通俗史学》(1993)引入西方学界“大传统”/“小传统”,“精英文化”/“通俗文化”的理论来阐发通俗史学。“通俗史学”这个概念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采用,成为学术界通行的概念术语。^②

(二)通俗史学的内涵界定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通俗史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是承接通俗历史演义、通俗历史小说而来,但通俗史学与通俗小说演义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而需要对其内涵做一严格的界定。

在通俗史学内涵的界定上,有的论著将唐代俗讲中的历史故事,至宋元明清时期的讲史、说书、平话等,都看成是通俗史学。这样的界定,容易淆乱史学与文艺作品之间的界限。朱维铮认为讲史小说与史学著作的区分并不在于雅俗之别,而是体现在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上:“人们常以为讲史小说和历史著作,主要是雅俗有别。是这样吗?不然。史书本来就有雅俗之分,通俗的就是历史普及读物。既称历史,则无论雅俗,第一大忌就是陈述存在主观虚构,即使细节也要求力求符合历史真实。而这一大忌,恰好是小说家不能拘泥的。因为在他那里,历史不过是创作的素材,艺术加工的原料,借以抒发现实的感情,理想和追求的寄托。”^③文学中的雅和俗与史学不能混为一谈。乔治忠也认为,学术界使用“通俗史学”的概念,容易把知识普及和大众娱乐相混淆,因此主张使用“普及性史学”这一概念:“就普及性史学著述而言,其体例遵从史学规范,而不是迁就娱乐方式;其历史内容是追求写实,而不是形象塑造;其见解为据事抒发的理性分析,而不是通过故事情节典型化、夸张化的加工描绘。”^④乔治忠强调“普及性史学”是“史学”,而不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各类文艺作品,这一见解是正确的。但是乔治忠也提到,“‘通俗’一词并非不可用”。韩树峰在评易中天《品三国》时把与历史有关的通俗作品做了区分:“一类是对历史事实加以发挥和演

①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95页。

②学术界对“通俗史学”的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逐渐增多,可能与80年代中后期的“史学危机”论以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历史学应该如何应对的时代大背景有关。

③朱维铮:《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见《走出中世纪》,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

④乔治忠:《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见《文明演进源流的思考: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瞿林东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6-297页。

绎,带有浓厚的戏说成分,可以称之为文学作品;一类是尊重历史事实,辨伪求真,用通俗的语言力求将历史真相如实地叙述出来,可以称之为历史作品。”^①通俗的文学作品和史学作品的性质完全不同。《百家讲坛》的主讲者王立群把历史分成了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历史、传播的历史、接受的历史四种,其中传播的历史又可一分为二:“一种叫作历史的传播,严格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解读,另一种叫文艺界的传播,不一定完全忠实于文献记载,一定会有杜撰的人物和情节。”^②《百家讲坛》的讲史属前者,电视剧、电影、小说中的历史则属后者。综合上述观点,本书采用学术界较为常用的名称“通俗史学”,同时根据上述意见而将通俗史学的内涵做一严格界定:通俗史学,就是为了适应历史知识传播的需要,采用各种浅显易懂、容易理解的方式来叙述历史或是对历史知识进行加工改造,以达到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

通俗史学亦可将其视为历史知识的通俗化、普及化、大众化。“通俗”“普及”和“大众”是分别针对了作品文本、传播方式与接受对象而言的,只是表述的侧重点不同,而从根本上来说,这三者是互为表里的。本书以“通俗史学”为名,亦兼用历史知识普及这一概念。“通俗史学”还可等同于“历史知识社会化”,“历史知识社会化”指的就是使历史知识走出学术的象牙塔,面向广大民众,走向社会,实现历史知识的普及,正如汪高鑫所说:“历史知识的社会化问题,其实也就是历史知识的普及化问题。”^③通俗史学又可分成广、狭二义,广义的通俗史学包含了口头的、图画的、影像的、文本的诸形式,狭义的通俗史学仅指以文本的形式来普及历史知识,又可称其为历史通俗读物或历史普及读物。

(三) 通俗史学的基本特征

通俗史学是将历史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进行普及,这就涉及了通俗史学的两个关键词:“通俗”和“史学”,史学是其内在本质,通俗是其外在表征。因此,通俗史学的基本特征即是基于“通俗”和“史学”这两大关键词。

第一,通俗史学的内容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普及的是历史知识而非其他,通俗史学是史学,而与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小说有本质的区别。通俗史学有别于文学。

通俗史学的内容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是其成为历史知识的必要条件,而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必须经过专业历史学家严格的批

①韩树峰:《历史作品中的非历史因素——以〈品三国〉为个案》,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期。

②王立群:《让〈史记〉走入寻常百姓家》,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30日。

③汪高鑫:《论历史知识社会化的基本原则》,见《“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社会化和社会进步”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第10页。

判考证。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创立了内证和外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兰克后学伯伦汉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方法:“史家须分二种之判断,其一在断定该项传说情节,是否可作为证据,或可用之至何程度。其二则在断定此项证据与事实之关系如何,即证据是否可信,是否有其或然性,是否为可能者。前者谓之低级的或外表的考证,后者则谓之高级的或内在的考证。”^①虽然海登·怀特有关历史叙事等同于文学叙事的观点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怀特过于强调叙事内容的组合编排却“忽略了历史学家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他们在为自己的论点做出论证时所遵循的证据规则”。^②考证的步骤、过程等对于通俗史学来说或许可以省略,但通俗史学必须参考、吸收、采用历史学家经过考证而得出的历史知识。

反之,对于各种历史上的记载不经过一番严格的分析批判考证则不能称其为历史知识,当然更不能将其当作可靠的知识来进行传播。通俗史学的读者大多都是普通民众,“一般公众,大都对于诚实可信之通俗化与假冒欺骗之通俗化二者间,不能明白辨别……世固有若干谬妄可笑之人,将彼所未曾致力研究之事,遂加采撷撮取,以供他人之用,或于彼自身尚属未晓之事,辄用以教诲他人。故在大多数历史之通俗化著作中,不免发现各种之污点,其污点常为绩学者发见以为笑乐”。^③

通俗史学是史学^④而非是通俗历史演义、通俗历史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历史演义、历史小说是指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面貌的文学艺术创作。“历史”一词是对“小说”的修饰和限定,以区别于神话小说、公案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玄幻小说等其他小说门类。历史小说“所叙述事实大体以历史为根据,而又以己意捏造种种之事实,以辅佐其趣味者也。其所述之事实大抵真者一而伪者九”。^⑤历史小说,就其本质而言,还是属文学作品而非是史学作品。我们评价一部历史小说,主要是看小说写得如何,要看它故事叙述是否精彩,人物个性塑造是否成功等等。历史只不过是小说的时代背景,历史小说中有多少历史的因素在内,或是历史小说能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史料,根本不能作为对历史小说的评判标准。史籍文献记载不可避

①[德]伯伦汉著,陈翰译:《史学方法论》中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9页。

②[英]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③[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92页。

④史学著作当中也有不少想象与虚构的情节,例如吕思勉指《史记》中“鸿门宴”之不合情理,陈寅恪认为《三国志》中若干篇目混入印度故事等等,这些都需要历史学家进行严肃的考辨和分析,但从未有人因此而以《史记》《三国志》等归于文学作品并将之剔除出史部。当然,历史学的想象虚构与文学创作的想象虚构之间的异同,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⑤吕思勉:《小说丛话》,见《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77页。

兰州大学文库

免地存在着错记、疏漏、讳饰、篡改等失真现象,需要历史学家考订辩证;历史小说中对时代背景的渲染,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故事情节的虚构等,也与历史事实有着一定的差距,有时也需要将文学还原为历史。对史籍文献的考订辩证后还原为历史真实与将文艺小说的想象虚构还原为历史真实,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历史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主要体现在:(1)小说的时代背景和主要人物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例如,《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历史,但是“历史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大略的故事框架,一个时空断限。历史人物已被重新塑造,历史事件已被重新安排。它不再像历史典籍那样去真实地记录和叙述历史,而是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去塑造、虚构历史,把作者对历史进程的把握和对历史人物的爱憎,对时代精神的阐释全都融合到一起,将三国历史加以演绎、虚构、渲染,或者改头换面,或者添枝加叶,已非原来历史的真实面目”,“就大略言之,《三国演义》的主干或有六七成真,但就其总体内容而言,最多当在五成真以下”。^① (2)小说中出现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内容,即所谓之“静的历史”,必须与历史事实相一致。例如,梁启超举《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为例,认为此事实固然是作者虚构,但是“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便可借助佛门作遁逃藪”。^②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的有关记载是绝佳史料。^③借助度牒便可以“作遁逃藪”是元、明间之事实,是否也符合宋朝之实际,答案同样是肯定的。根据吴晗的研究,1067年宋朝政府开始买卖度牒,直至宋亡,“如果犯了杀人大罪,出家更是逃避法律制裁的有效手段”。^④ (3)历史小说中的文学艺术上的想象和虚构必须符合历史中存在的可能性,“在正史说之不尽道之不明之处,历史小说可做自由的发挥,只要合于情理,不悖史实,能够自圆其说即可”。^⑤而对历史小说进行的艺术加工创作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郭沫若在《历史·史剧·现实》一文中所说:“史有佚文,史学家只能找,找不到也就只好存疑。史有佚文,史剧家却须要造,造不好那就等于多事。”^⑥郭沫若曾以《九月菊》为例,黄巢九

①朱大渭:《三国历史与〈三国演义〉》,见《六朝史论集续编》,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73-74页。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50页。

③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2-463页)。

④吴晗:《度牒》,见《灯下集》,三联书店2006年,第65页。

⑤刘舒曼:《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小说》,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5日。

⑥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96页。

月进京赶考,考试不第,题了菊花反诗,这是他造反起义的契机。但于此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黄巢是如何进的京,进京后接触些什么人,当时长安是什么情况,考试如何进行,赋菊花诗时的具体情景如何等等,史书上都没有记载,无法“找”寻,而《九月菊》就要“造”出这些佚文和失事,而且要力求造得有声有色,符合历史真实。从中可以看出,“找”和“造”正对应着史学和文学的分野,但是“造”也不是胡编乱造。

历史小说是在不违背基本史实基础上的文学艺术创作,小说中不能出现“反历史”的情节,从而对历史进行颠覆性的叙述和解释,最著名的是民国初年周大荒的《反三国志演义》。据说作者曾“三易其稿,对该书反复修订,并挖地五尺深置手稿,故该书稿是深埋半百,一朝面世”。该书取汉末三国时代之背景和历史演义中之人物,完全进行架空历史式的叙述,书中的故事情节基本上于史无征,全出于作者的凭空构思和想象。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即认为:“《三国演义》固为小说,事实不免附会,然其取材,则颇博赡……不可尽以小说亡稽,而斥之也。”^①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有部分以“历史演义”为名的著作,虽然在形式上采用了历史演义这一体裁,用章回体来进行叙述,其中也不乏“话说”“却说”“且听下回分解”等词句,但在内容上则严格以史料为依据,作者的撰述不超越史料的范围。例如,上举晚清的《嚳粟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916—1926)等,都可以看成是通俗史学著作。到了20世纪,梁启超、顾颉刚等历史学家也都曾经提倡用演义体来创作历史,同样也是借演义体的形式来普及历史知识,因为演义体的形式更适应广大民众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所以需要“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用演义体叙述之”^②,以求能够更好地传播历史知识。顾颉刚在抗战期间曾约请吕叔达撰写《中国通史演义》,从上古至太平天国,共一百五十万字。后又请陈释常将上古部分扩充而成《中国上古史演义》(上海四联出版社1955),上古史在司马迁时代已是史料不足,还存在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想要恢复古史的全貌,那就像捡拾了一部分古董残片要想把它们拼成整个原物一般;拼的时候,当然不免花费许多补苴涂附的工夫”。^③在史料不足的前提下,文学小说可以“造”,但史学叙事却不能虚构,“补苴涂附”即是通过柯林伍德所谓的弥

①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00页。

②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③顾颉刚:《宝树园文存·陈懋恒中国上古史演义序》,见《顾颉刚全集》第35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378页,陈懋恒即陈释常。